

信物传承

烽火记忆·东海回声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历史的指针再次指向抗战胜利的荣光时刻，我们回望烽烟弥漫的岁月，目光聚焦于东海之滨的温岭。八十载光阴流转，那些曾亲历山河破碎、浴血奋战的温岭老者，是这段壮烈史诗最后的鲜活见证；一件件沉默却饱含故事的老物件，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血泪与抗争。

从日军铁蹄数次践踏侵扰的伤痛，到温岭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坚韧，无数平凡身影汇入救亡图存的洪流。铭记温岭抗战的历史细节与温度，聆听亲历者的讲述，触摸岁月的痕迹，不仅是对先辈英烈的深切缅怀，更是守护民族记忆的烛火，让它照亮我们珍视和平、开创未来的道路。

一张老照片，记录温岭抗日最强音

记者 赵云

80多年前，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横湖队到农村宣传抗日，团员们在“以血肉保卫民族”大标语下合影。

“以血肉保卫民族，这是温岭青年发出的抗日最强音。”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温岭抗日战争纪实》主编叶海林说，这张老照片意义重大，弥足珍贵，是全国抗日文化的精品，曾被众多媒体转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0月，温岭爱国青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建立了抗日救亡团体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之后，青战团发展至68个分队，5000多名团员，系当时台州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

青战团成立后，迅速在全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他们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和各种宣传形式，大力宣传抗战形势和抗战理论，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抗日的大小字报和传单，并在醒目的地方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血肉保卫民族”等大幅标语。鸣戈剧团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重逢》《上前线》等十余个节目，在城乡巡回演出，深受群众欢迎。歌咏队成立后，印发《大家唱》单行本，在群众中教唱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游击队之歌》《救国军歌》等。歌咏队还上街演唱，引来许多群众围观应和，把宣传推向了高潮。青战团领导下的儿童团每天在大街小巷进行晨呼，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每当重要节日，青战团就组织全县青年举行纪念活动。1938年7月7日，青战团召开抗战一周年大会，发表宣言，向全县人民宣告“决心以血肉保卫温岭，誓与温岭共存亡，不驱逐寇寇出中国，决不休止”。

1938年12月，国民党温岭县政府下令取消青战团，青战团在请愿失败后被迫解散。青战团从成立到解散仅存在15个月，但它所创下的历史功绩，永远地留在温岭人民心中。

“青战团是温岭抗战文化史的组成部分，也为台州党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叶海林称，青战团不仅发挥了抗日救亡宣传队的先锋作用，更发挥了抗日救亡战斗队的先锋作用，为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一批杰出人才。

1938年1月，青战团派骨干叶雪翹、李言定、王绍梧去平阳山门闽浙边临时省委举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1938年暑期，又派三四十名团员参加台属特委在海门东山中学举办的青年运动骨干训练班。同年10月，青战团吸收各分队积极分子23人，组成抗日骨干训练班，称“干部营”，由县委书记李先导等授课。党在青战团中成立支部，先后吸收20多名骨干入党。

青战团解散后，温岭党组织响应长江局指示，向皖南新四军输送了两批青战团骨干，这些骨干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杰出人才。

1939年2月，县委领导梁耀南、李先导等在横河乡动员共产党员李言定等40名爱国青年组成抗日志愿军，奔赴抗日前线参战，这40名志愿军基本是青战团团员。

温岭人民抗战，从1931年1月共产党员陈叔亮在宗文中学组织爱国剧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开始，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为止，前后持续15年。

“纵观温岭党史，这不仅题材和素材丰富，而且在每个时期都有亮点。”叶海林说，这背后，是温岭人的骨子里始终有着硬气，有着敢为人先、敢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激情。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一条旧板凳，藏着一生的痛与恨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杨鹏

16年前，时年71岁的赵淑富将祖上传下来的一条长板凳，捐赠给市委党史研究室。这条板凳上，留有日本飞机轰炸、扫射潘郎时的弹孔，它是日本侵略军制造潘郎惨案的罪证。

如今，赵淑富将其和板凳的合影挂在了卧室门口。照片的下面，有一段沉痛的文字：1941年4月16日，日机轰炸潘郎，制造了17人死亡、4人受伤的人听闻的惨案。我父亲的头盖骨被炸开，脑浆直往外流；母亲胸部中弹，血流如注；堂兄被炸得身首分离。我的眼睛、大腿、腰部多处中弹，遍体鳞伤，经抢救医治，小命虽然被捡回，但是一只眼睛瞎了，腰腿也落下了永远无法治愈的病根，成了终身残疾。

赵淑富卧室的后面，长了一棵粗壮的樟树。樟树的另一侧，是赵淑富家的仓库。“这里，就是日本人炸弹投下的位置！”赵淑富说。

潘郎街曾是热闹的市集，每逢五、十为赶集日。那时，赵淑富的父亲赵德和母亲陈氏在街上做点小生意，家境非常不错。然而，日军的暴行彻底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

1941年4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温岭县城，共投燃烧弹两枚，弹落坊下街，引起大火蔓延。第二天，正值潘郎街的赶集日。大约上午9时，两架日军飞机从东边低空飞来，在潘郎街上空盘旋两圈后，随即丢下了两枚炸弹。一枚落在了赵淑富家屋后，另一枚落在了附近的稻田里。随着两声轰隆巨响，浓烟冲天而起，弥漫了半条潘郎街。

随后，敌机又用机枪向地面人群扫射。“当时，我父母正坐在桃树下，母亲抱着我喂奶，一家人都倒在了血泊中。”赵淑富说，人们给他们收尸时，听到了他的哭声，他的伯父含泪将他从血泊中抱回，送到附近的冠屿医院救治。

就这样，赵淑富的命保住了，但他落下了终身残疾，并沦为孤儿。伯父将他养大成人。期间，赵淑富吃了很多苦。

这次轰炸，除了赵德夫妻、侄子，遇难者还有木匠叶兴盛、教师叶家明、农民陈通三、剃头匠郭鼎等，共计17人，赵淑富等3人重伤，另有1人轻伤，县政府都给予了一定的救济金。

温岭被日军侵扰，发生在“宁绍战役”前后。1941年4月14日，日军第13军司令部从上海推进到杭州，开始集结兵力，准备向浙江沿海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旨在封锁沿海港口、掠夺战略物资，并占领宁绍地区。

从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日军从空中、海上、陆地三路犯温岭县，共达88次，烧毁、炸毁、震倒房屋4485间，有明细记载且有损失价值数量的房屋2849间，直接人口伤亡达263人。

赵淑富小时候没读过多少书，后来当上了村里的食堂长，还当过村干部。他到25岁才结婚，育有两子三女。

“我的身上共有7粒较大的子弹片，医生取出了5粒，还有2粒在眼睛里面取不出来，小的碎片后来自行掉下来一些。”赵淑富称，至今，他的身体里还留有一些子弹碎片。

赵淑富时常在想，如果没有这次灾难，他们一家人都好好的，他一定能和同龄人一样，好好上学，当一名人民教师。

提及日军暴行，赵淑富心里仍充满仇恨。他希望子孙后代牢牢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牢牢记住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给温岭人民、给无数家庭带来的沉重灾难。

一份画报，让听闻找到印证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江文辉 文/图



在松门镇叶远东的家中，一本纸张泛黄的旧画报被郑重地摊开在桌面上。叶远东指尖轻触纸页，目光久久停留在“松门上陆”的几张黑白照片上。

1941年4月，日军登陆，入侵石塘、松门、淋川，大肆烧杀抢掠，给温岭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1966年出生的叶远东，从小就长辈口中听闻这段悲痛的历史。

叶远东原本潜心于中国水墨丹青的收藏，系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台州市收藏家协会会员。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缘，一批抗战时期的旧物撞入视野，他的心弦瞬间被拨动，他收藏了几张日军侵略海门、松门等地的登陆照片。

今年上半年，叶远东在收藏圈里，发现了一本《支那事变画报》（第95期）。“支那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对全面侵华战争的美化称

呼。在这一时期，日本妄图通过武力迅速征服中国，为了配合其军事行动，在日本国内及占领区展开大规模的宣传，通过出版大量画报进行舆论操控。《支那事变画报》创刊于1937年，旨在向日本民众以及世界宣扬其所谓的“战果”，粉饰侵略行径，误导国际舆论，为侵略战争披上“正义”的外衣。如今，这些画报成为他们侵略罪行的铁证。

“我之所以收藏这本画报，是因为里面有日军登陆松门的章节。”叶远东称，这本画报中，一幅幅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日军侵略浙东沿海、福建等地的场景，其中侵略松门的图片共有5张。叶远东幼年听闻的日军入侵松门往事，在画报冷酷的光影中找到了印证。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性节点，叶远东觉得这份收藏格外沉重。这本画报不仅是私人珍藏，更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叶远东说，无声的影像能发出最有力的警示强音，让后人永远看清这段历史。



一份起诉状，诉不尽日军暴行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江文辉 文/图

8月13日，88岁的退休教师曾合满，拿着装满资料的牛皮纸袋，行走在家门口的松门淋头老街时，心中仍充满愤怒。牛皮纸袋里装着的，是84年前日军在淋头街犯下的累累罪行。

1941年4月24日，日军自松门经八甲塘头至淋头街，放火焚烧街屋。全街除一座民房外，皆成瓦砾。当时，曾合满才4岁。

曾合满一家在淋头街开小百货店，听说日本兵要来，曾合满和姐姐被母亲潘三妹带到舅舅家避难。因店里东西太多，父亲曾皆仁留下来看家，把贵重的东西都放到脚踏车上，准备一有情况就走。

上午10时左右，见街上没什么动静，曾皆仁悄悄地打开一块窗板，刚探出头去，就被日本兵发现了。接着，他被日本兵赶到了官河南岸。等他绕河回到街头时，淋头街已是火光冲天。曾合满听母亲说，当时的火势很猛，人在一里外都能感受到滚滚热浪，不能靠近。

“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还进不去，热度太高，等到第三天，回来的百姓只能看到一大片烧得乌黑的瓦砾和呛人泪下的浓烟。”曾合满说，大家一边哭，一边在灰烬里挖掘些有用的东西，如铜板、银洋等烧不掉的东西，饿得没办法，只好挖些未烧尽的焦谷焦米来充饥。

曾皆仁就是吃了这些焦米，开始便秘，继而便血，几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潘三妹带着一双儿女，生活非常艰辛。潘三妹告诫曾合满：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的房子是被日本人烧毁的，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后来，曾合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退休后，他和其他离退休干部一起，对日军侵略淋头街开展调查，抢救口述史。通过长时间的努力，他们共回收917份登记资料，74份签名表，6000余人的签名。这些为《温岭抗日战争纪实》的编著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2015年8月24日，曾合满等经历惨案的77名在世受害人，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登报道歉，并索赔每户200万元。

遗憾的是，这次民间提起的对日索赔诉讼并未取得成功。但曾合满一直保留着起诉状，上面记载着日军当年的暴行：1941年4月23日，日本侵略部队在木耳山登陆，东去松门，烧毁松门镇民房及庙宇500多间。第二天又来淋川镇烧掉了全镇房屋共1800余间，枪杀和烧死无辜群众40余人，造成2300多户家庭流离失所，6000人无家可归，史称“温岭惨案”。

“被告日本政府在中国犯下滔天的战争罪行与反人道暴行，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必须予以追究。”起诉状上，曾合满态度十分坚决。

如今，经历惨案的在世受害人越来越少了。诉讼受阻后，曾合满将愤怒淬炼成责任，将个人创伤升华为公共记忆。在村文化礼堂里，曾合满经常将日军的罪行讲给村民听。在他的讲述下，1941年4月的焦土与血痕，被越来越多年轻人铭记。

“我要让大家明白，淋川人民的血泪仇和民族恨永远不能忘记，历史的悲剧决不许重演。”曾合满说。